

“礼”思想和经济活动

菅野觉明

中文提要：在讨论后现代思想时，对经济的规定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讨论经济的方法都被西方的思想、科学所霸占，儒教等东方的传统思想则受到忽视。

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总体的一部分，古今中外，掌握人类活动全体性的伦理学、人伦思想都思索经济的本质问题。例如，代表近代日本伦理学的和辻哲郎的伦理学中，将人的本质视作是人类共同实现的要求；经济活动也不再是满足欲望的活动，而是被视作为以欲望的充足为媒介的、指向普遍的人类共同（人伦）实现的活动。和辻伦理学不仅受到西方伦理学的影响，还受到佛教的空、伊藤仁斋的儒学等东方思想的影响。

不仅是在和辻伦理学，在近代以前的儒学思想中寻找将现代经济相对化的思想根据并不难。获生徂徕的礼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

经济这一术语出自儒教中经世济民这一概念。获生徂徕批评朱子学的修养主义，主张根据外在的事物、制度，回归到统治术的儒教。如果说经济是财货这一“物”的关系的总体，那么作为“物”的道德主体的礼就属于从人伦出发掌握经济的方法。

获生徂徕的礼的思想并非将经济活动视作是自然欲望的满足，而看作是与自然断绝一切关系的一种根据文化欲望（文）的行为。这种理解根本上批评了近代经济观中将自然欲望的满足视作是经济根源的观点。包括儒教在内，从仪礼世界发展而来的亚洲传统思想中包含着诸多将现今的市场经济相对化的智慧。

关键词：经济，和辻哲郎，人伦，获生徂徠，礼，文

一、和辻伦理学的“经济组织”论

始于儒教的亚洲传统思想，在讨论“后现代性”的时候，首先不得明确的点是“现代”究竟是什么。然而，所谓现代或现代性，是关涉到当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大问题，把这全部作为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本论文将问题局限在围绕“经济”的思想上，对传统思想的可能性进行思考。

所谓“经济”，在这里视其为极其单纯的物（财货）的生成、流通、消费活动的总体。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活动、关系的总体，即“市场经济”。经济人是被假定为以满足欲望的需要为原理来行动（利己的）、付出最少的努力和支出获得最大效用（打算的、合理的）的一种人的类型。

当然，作为合理的经济主体的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它是由于将现实中的人片面地抽象化而造成的一种虚构。于是，所谓由经济人的活动形成的合理的、数量的系统的市场经济，也不过是在假定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观点。现代经济学将抽象化的现实组成计算公式体系，决不是对现实的人际关系的把握。因此这样的现代经济观，当然地受到从各种立场上发出的反反复复的批判。

例如，现代的经济观中，假定为经济现象的单纯模型的原始经济大致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这一点被马林诺夫斯基和莫尔斯所证实。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的未开化社会研究明确指出，原始经济的实态是根据利己性、合理性即与所谓“经济原则”截然不同的原理形成的。经济现象包括处在无私无欲活动和单纯利益追求活动两极之间的各个阶段，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全部还原于经济的合理主义。随着未开化社会研究，基于与利润追求不同动机的经济活动，或者与市场经济不同的交换组织（所谓非市场经济）等等，经济原则中无法解释的不合理的经济现象被重新照明。马林诺夫斯基和莫尔斯的研究指出，经济的本质只能在与人类

全部活动的关联中找到。经济不是作为其自身独立存在的功利主义的活动领域用莫尔斯的话来说应当理解为一个“全体社会的事象”。

穆尔斯认为，人类活动的全体性是赠与、交换的普遍系统。受到这种观点的启示，在今天展开着各种各样要对作为交换体系特殊形态的市场经济进行相对化的理论。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的全体性是什么问题，是哲学思考中亘古不变的问题，并不是文化人类学的专利。以人类活动的全体性或全人类活动的本质为基础，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个别人类活动定位，是伦理学的最基本的想法。伦理学中，人类活动的全体性通常被称为人伦。而且认为经济也是人伦的一部分，是属于古今伦理学常识的想法。

今天的构造主义或经济人类学，作为“普遍交换体系”的全体性的一部分，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制度相对。虽然其本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如果说它是在人类活动的全体性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的再解释的话，也可以在伦理学的世界中找到一些先例。例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是人伦的缺乏状态的黑格尔的《法哲学》，认为资本主义是为了人伦实现要克服的历史阶段的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批判现代资产阶级道德是价值的颠倒的舍勒的怨恨论等等。本论文将在与东洋传统伦理思想有关的观点上，针对和辻哲郎的《伦理学》中围绕“经济组织”的讨论进行研究。

和辻伦理学中全人类活动的绝对全体性体现在：“通过自他对立之‘异’的立场，在实现自他不二之‘同’的运动中发现其根本的统一”。和辻认为，存在于全人类活动根本的原理不但不是生物的欲望，而且也不是追求与自然法则统一的理性的要求，而是追求共同性的人类存在的理法，换句话说，是追求人伦合一的“人伦的理法”。

人既是私的、个别的存在，也经常为了实现自他的合一、共同而运动。如果其目的只是为了生存的话，人在个体至多家庭规模的小型私的存在中也能得到满足。但是，人类的活动在不断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向更大规模的人类共同扩展

开来。因为尽可能实现人类共同正是人类回归其本来性的行为。

任何人类活动，它所追求的都是人伦的实现。所有人类活动的本来意义在于对应其形态实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共同性，经济活动也不例外。和辻在《伦理学》本论第3章“人伦的组织”中，对以“财”为媒介的人类共同及“经济组织”，大致论述了以下的观点。

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中，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欲望，由经济活动形成的人际关系不过是满足欲望的手段。然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经济研究所指出的事实是完全相反的。即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作为人伦组织具有其自身的意义，满足欲望只不过是实现人伦组织的媒介而已。这正如招待客人并不是为了满足客人的食欲，而是以满足客人食欲为手段实现交流感情的目的。

满足欲望是手段与实现人伦是目的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当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也是事实。劳动者并不是为了满足衣食住的欲望而勤劳工作的。他们是为了家庭能够安定地生活而劳动的，满足欲望不过是实现家庭快乐的手段。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生产出的财货。原始经济中，生产出的财货作为礼物联系着人伦组织。礼物的目的显然在于人际关系本身，由此而来的欲望满足是为人际关系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值也不在欲望的满足，而在人伦的意义上。例如，作为商品的食品的价值，不能以食欲充足物为尺度来衡量。作为食品的价值（味道、营养、新鲜度等）在食品生产出来的瞬间是最高的，到了消费者手中的时候价值可能会降低至少不会升高。尽管如此，通过流通过程作为商品的食品的价值在升高。使食品的价值升高的是许多人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在于不认识的人即他人的服务，而商品的买卖并不是欲望充足的媒介，而是相互服务的人伦合一的媒介。

像这样以经济活动为媒介联系起来的人类共同（经济的组织），无论是非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其本质都是“以财为媒介的人伦组织”。而且在这个共同性中，经济活动的目的并不是“欲望充足其本身”，而是“通过欲望充足的人伦的合一”。

现代经济学或经济哲学未能正确地把握经济的现实。然而，为什么未能正确把握现实的观点能够作为今天常识的经济理解来通行呢？

和辻说，那是由于机械的大量的商品生产支配经济大局的结果。即排除制造的喜悦、个性的实现、与他人的信赖关系等人化的东西，单单以量的关心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取得胜利，致使经济失去人伦的意义，并且造成公利价值和人伦意义的价值序列的颠倒。和辻强调，对视公利价值为最高价值、视人伦为手段的价值颠倒（例如把“正直”当作是“赚钱”手段的观点）进行“再颠倒”是当代的任务。

经济组织不是根据利害打算而建立的利益社会（Gesellschaft），而是一种与家族或地缘共同体（共同社会，Gemeinschaft）发生质的连续，并超越其地域限制而扩大的人伦组织的形态。财货的交换超越地域把许多互不相识的人联系起来。然而因为是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关系，就直接断定它是打算的契约关系，那是个大错误。以财货为媒介建立超地域的人际关系的本来动机，在于更加宽阔的普遍的人类共同的要求，而决不在于打算的利益追求。在原始经济中，财的交换首先由“文化财”开始，在共有文化财的“文化的存在共同”成立之后才开始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和辻主张，向以文化财所担当的文化价值为媒介的普遍、精神共同的“文化共同体”发展，才是超越地域的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二、日本朱子学的经济观

以上简单地考察了和辻伦理学中围绕经济的讨论。认为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欲望充足或利益追求而在于人类共同性的实现的观点，无论东西方都是伦理学中普遍存在的。当然这种观点在功利主义思想中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例如，福泽谕吉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人类与他人的交往越广，就越会感到幸福。政治、法律、学问、工业、

贸易等人类的活动都是为了充分实现‘人类交际’。^①

当然，和辻知道福泽也论述着这样的主张。但是，和辻在展开“人伦的理法”的时候所考虑的，除了西方伦理学以外毕竟是儒教的人伦思想。

现在的日语、韩国语、中国语中，作为 economy 的译语而使用的“经济”一词，当然是从“经世济民”、“经国济民”的儒教概念中由来的。在日本，一段时期曾使用过“理财”一词，这也是出自《易大传》的“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经世济民”、“理财”都意味着谋求民众的衣食住的安定。它们以衣食住即生产、消费活动为对象，从这一点可以说它是事实上把握了经济的概念。然而如和辻也指出，“经世济民”的概念中并不包含 economy 或 economic 一词所具有的经济的合理性、实利性的 nuance（细微差别）。和辻认为，“经世济民”是在统治民众的立场即指导人伦实现的立场上解释经济现象的用语，使用“经济”一词来翻译含有经济合理性之意的 economy 是原本不恰当的。

儒教的人伦思想，是从施行“经世济民”的人伦立场上观察经济现象的。那么，儒教的理论对于现实的生产、流通、消费生活的总体是如何具体把握的呢？换句话说，在儒教的人伦体系中经济的本质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呢？下面结合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对此进行考察。

日本历史上，货币经济渗透到国内各个角落大概是 17 世纪的事情，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历史上儒教最鼎盛的时期。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主流是宋学系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派。众所周知，朱子学认为人类活动的全体性的人伦是“理”的体系。理在人类世界中体现为五伦五常之道的道德秩序（“当然之理”）；在每个事物中体现为“自然之条理”。经济活动也作为当然及当然之理的一端，即体现为构成自然的和谐的、合理的秩序的道德行为（“诚实”地尽“职分”）。农工的生产活动是参与天地的

^① 《劝学论》第 9 篇。

“生生”之理；业是实现物的流通、分配的和谐秩序的行为。消费活动则是给家庭这个人伦的组织带来安宁的道德行为。朱子学的思考中，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都是把绝对的自己同一性（寂然不动）的形而上之理作为其原理的静秩序的一个环节。

认为自然是道德秩序的原理的朱子学所主张的乐观主义的自然主义，可以说是在说明变化少的社会时极为有效的理论。实际在日本，朱子学的儒学很适合战乱结束后以为太平盛世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江户时代前期的社会纷围，因而得以流行。朱子学规定和谐性、安定性为自然的本质，认为被视为绝对的道德存在的天是普遍人性的模式。反过来说，不安定或过激的自然、社会现象和不顺从人类内部秩序的倾向，是指脱离原本自然的例外。而且，近世中期朱子学者面对的是无法收入到和谐的自然框架中的欲望涡卷的货币经济的奔流。

如果是通过以直接生产为依据的自给自足来形成经济大局的社会，那么朱子学的理的体系也会在把握经济中发挥其相应的有效性。然而，不介入任何感情在一瞬间达成千石万石的大米卖买的巨大商品市场的运作，是用我们每天经历的平稳的规范自然的思考模式根本不能理解的。卖葡萄的商人为了抬高价格，在运送途中将五匹马运载的货物或是叁匹马运载的货物全部扔下山谷^①。这种数量化的抽象欲望是用基于自然人类的“气质”模式无法把握的。

当然近世朱子学中，试图把握包括日益庞大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实情在内的经济活动总体并反映到经济政策中的思考不是没有的。但他们并没有改变将朱子学的原理原则规范地适用于现实的僵硬的态度。认为理的体系是绝对、普遍的，经济现象不管采取何种形态必然而且必须进入到理中的信念是不变的。换句话说，朱子学者的经济观一步也没有脱离符合身材的自然的衣食住即自给自足经济的模式。

到了近世中期，经济活动的大局进入市场的支配之下，普通平民已经知道经

① 荻生徂徕，《政谈》卷二。

济现象的本质在于时价（相場）的变动。认为时价是“天所成”^①，顺应时价变动的纯粹的营利活动是完成“天之道”的颠倒的价值观被堂而皇之地主张出来。即便是对于这种投机的资本主义现象，朱子学的思考也没有改变其观点，即“圣人的道，在于教人以天地自然之礼，节其欲。故要牢记顺天地行事，不可奉仕无理”^②。巨大的商品市场的剧变，归根到底和“食欲”一样不过是自然欲望的一时的偏离现象，可以通过基于天地自然的礼制进行控制。认为只有自给自足的经济、非市场经济才是合乎理的经济活动，市场的变动是利益熏心的一部分商人的“奸曲所成”。因此，近世儒学者们的经济政策中，反复主张抑制市场经济的“无理”使它们恢复到合乎本来之理的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模式，它们以各种“俭约”策的提言形式出现。

儒学者们站在不存在理外之物的大前提下，终究没有把握作为新的理外之理而登场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吗？显然，展现在眼前的天地之运行或蝌蚪也是青蛙的事物之条理和市场经济的巨大复杂的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容直线测量的距离。在梅花树上总是开梅花的道理的延长线上把握市场经济的道理，实在是“无理”的事。然而，这是由于根据从自然抽象化的规范来规定人类活动的全体性的朱子学的乐观主义或严格主义引发的局限性，并不意味儒教思想本身完全无力把握经济。

原来儒教在远古时期就存在着把握具体抽象的人类活动全体性的概念体系。那就是“礼”。礼是概念体系的同时也是成文的制度。儒教的理论（儒学）原来是为了说明礼而产生的，绝不与之相反。更具体地说，朱子学没有把握好经济这一人类活动的现实，不是没能把握具体的现实，而是在把握说明它的“理”的方法上存在着问题。

圣人根据理来教诲的是礼，这一理解可以说是儒学的大原则。认为这“理”在于凡是人都能接受的单纯明了的事物之条理的延续线上的理解，既是朱子学的

① 石田梅严，《都鄙问答》卷二。

② 山鹿素行，《山鹿语类》“君道”。

特点也是问题的焦点。朱子学的局限性体现在根据单纯的理来裁断复杂的人类活动。

然而，礼是将复杂的人类活动依旧复杂地理解为全体的。因此，如果与朱子学相反就复杂的人类活动的方面考虑其秩序，那么是不是理绝对不能理解为单纯抽象的合理性，而是以深奥的姿态呈现呢？

儒教暂且保留所谓礼这个把人类的行为的、物的关系的全体性作为对象来把握的观点，是否能从把握和检讨礼制本身具有的人类活动的全体性出发，开发出把握经济的全新的智慧呢？下一节将讨论荻生徂徕的儒学说，并探讨儒教所具有的后现代的可能性。

三、荻生徂徕的“礼乐”论

礼是作为具体的制度所规定的人际关系秩序的体系。因此，礼作为外在的、物的行为关系把握人类活动的全体性，不仅不是抽象的理的体系，而且也不是眼睛看不到的精神构造。礼首先是物的关系，即作为物来把握人类活动的全体性。

但是在儒学的传统中，重视礼作为物的性格其本身的理论几乎不曾自觉地形成。如果说是围绕礼的理论的话，可以说其大部分不是基于实践关心的制度研究，就是把表现为礼的形态的道德精神或理当作问题。就这一点看，将儒教的人伦之道直率地理解为物的体系的荻生徂徕的儒学，开启了儒学未开发的可能性，的确值得瞩目。

简单地说，荻生徂徕的儒学是作为与近世前期思想界的主流朱子学的思考相对的反题（Antithese）而形成的。在徂徕看来，道不仅不是“事物当行之理”，也不是“天地自然之道”。“道”是圣人制作的天下国家统治之“术”，具体地是“礼乐刑政”的制度。

不深入到徂徕道论的细节内容，单单局限在把握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的话，

徂徠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认为人类活动的全体性不是理而是物的体系。对于徂徠来说，道无论如何都是“安民之道”、“经世济民之道”。即道是在谋求民众衣食住的安定的立场上所把握的人类活动的全体性。圣人的教诲追求的并不是每个人的自治之道（心法），而是使无数人多样的生的活动实现和谐的全体性。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自身的资质、能力努力寻求生活。对于普通的一般人，生活是自己自身寻求的全部，人类活动的全体性不在视野之内。为政者的作用就是引导每个人使他们生活实现的总体形成一个和谐的全体性。而且，使人们认为是自己的事来寻求的生活，在不自觉中成为实现和谐的全体性的媒介，其手段就是作为物的礼乐。

众所周知，礼乐是将包括衣食住的所有人类活动以具体的形式制度化的。徂徠认为，人类在不自觉中进行的生的活动，只有依据作为“物”的礼乐才能成为和谐的全体性即人伦的实现。如前所述，和辻哲郎认为，所谓经济是以财货为媒介的人伦的实现。根据和辻的这种说法，可以说徂徠把握的礼乐是以财货为媒介的一个人伦实现的具体形态。和辻认为，经济的表面性的具体形态是以财货为目的的活动，人伦则作为其活动看不到的意义（人伦的意志）构成其本质。但是对于徂徠来说，礼乐不是意义或道理而是具体物。即生产、流通、消费活动（经济）的人伦的意义不是礼乐，其人伦的实现形式才是礼乐。

徂徠说，“民以营生为务”^①，又说，“流通”是“备于天性商人职分之道”，于此无人能及商人（《问答书》）。所谓“务”、“职分”，是指生产、消费及流通活动就当事者而言好像其本身就是目的一样进行着。农民把农业生产，工人把器物生产，商人把流通，一般人把生产、消费、交换的生的活动其本身作为目的进行着。然而这些活动绝非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作为人类活动全体性的人伦的一部分而存在。只是他对于民众而言不是被自觉的也没有必要必须被自觉。因为全体性的自觉只有在广大无边的全人类活动的观点上才具有可能性，并

① 《弁道·义》。

非是人就能做得到。徂徠认为，这个全体性的自觉者就是儒教所说的圣人。其根据在于认为道是圣人所作的儒教教典的传承。

无论古今，大多数人不是靠特别高尚的理念来生活，而是以生活本身为目的而生活。而且人和人之间有着资质和能力的差别，如果说有善人，恶人也为数不少。尽管如此，人们活动的总体并未陷入混沌、无秩序状态，而是形成一个全体性（人伦）。徂徠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在不自觉中实现人伦，是因为人伦的实现形态作为伴随具体物的制度已经传达给人了。实现形态存在于现在是说人伦的全体性已经被自觉。也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已经有人把人类活动的全体性毫无保留地理解为那个全体性了。这个全体性，不作为语言的理论，而作为物的形态，传给后代的就是礼乐。而且理解这个全体性的人被特定为“圣人”就是徂徠对于圣人的“信”。

只要符合礼乐的制度，任何人类活动就都是在实现其本来的存在形态即人伦。经济活动当然也不例外。经济是礼体系的一个环节而决不是经济人的欲望体系。那么认为经济是礼体系的想法对经济的本质是怎样理解的呢？

四、作为“文”“饰”的经济

如“经礼叁百，曲礼叁千”^①、“礼仪叁百，威仪叁千”^②，礼是规定人的所有活动的具体的形态和规范。因此，如果观察每一种礼，它们不是某种特殊的行为，而是人日常的行为和行动。例如，最严肃的礼之一“射”，如果把它单纯地看作一系列的行为，它不外是拔箭射中目标的普遍存在的生活活动（获取猎物、射倒敌人）。

那么，作为礼的射和日常实用行为的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① 《礼记·礼记》。

② 《中庸》。

现代人的常识性理解是，作为获取猎物和射倒敌人的行为的射才是射的自体、本质，作为礼的射只是模仿了本来实用的射的形态的抽象。因为在今天对仪礼的一般观念是，认为实用的行为是现实的，仪礼的行为是现实的抽象化或是没有实体的装饰。

但是徂徕的想法或许与此正相反。徂徕关于《论语·八佾》“子曰射不主皮”章，这样说道：

古代有叁种射，即‘礼射’、‘主皮之射’、‘贯革之射’。礼射以礼乐即‘道’为目的；主皮之射以命中目标获取猎物为目的；贯革之射以穿透盔甲射倒敌人为目的。礼射是君子之射；主皮之射是庶民之射；贯革之射是力士之射。^①

礼射是不以实用性为目的的、作为装饰和文化的行为；主皮之射及贯革之射是作为经济活动和军事行动进行的实用性行为。那么射弓行为的本质在哪里？徂徕显然认为就在于非实用的、文化的行为。也就是说，射本来是关涉道的实现的行为，它所带来的实利是次要的。

贯穿于徂徕的经济理解的根基是，与现代人正反面的想法，即不认为装饰为主、实利实用只是附带品。徂徕在披沥自己独创的道为圣人所作的主张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古之圣人，以安天下为务，是以尽其心力，极其知巧，作为是道，使天下后世之人由是而行之。伏羲、黄帝、神农始立利用厚生之道。然方其时，正德之道未立。至于尧舜，制作礼乐，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王道肇是矣。^②

① 《论语微》。

② 《弁道》，《弁名·圣》。

如果是朱子学派，则撇开当然不会承认的“作为”论的是非问题，只想关于经济理解确认自以为重要的观点。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徂徠承认在经济活动和自然之间确实存在断绝、飞跃。徂徠认为，利用厚生之道（渔业、调理、农耕、医业、度量衡、工具、衣服、币制等）不是自然的道而是作为的道。现代经济观认为经济活动是满足欲望的人的自然性的延长，而徂徠却认为生产、消费、交换活动是在自然以外增加的一种剩余。

其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徂徠没有把利用厚生之道视为其自身完结的全体性。换句话说，生产、消费、交换活动就其本身还不能作为人类活动完全自立。经济活动只有当它是礼乐的时候，才能成为人类本来的活动、正德之道。

当然，徂徠的礼乐论并不是为了把握经济的本质而展开的。但是我认为，即便不是徂徠所企图的，这两个理解中已经包含了对现代经济观进行重新思考的重要的头绪。

不限于经济学者，一般人对经济进行某种思考的时候，无论谁都以一个自明的命题为前提。这个命题就是，“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所必要的活动”。例如，从常识来看，没有人会对“农业生产是生存所必要的活动”表示怀疑。虽然徂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徂徠的礼乐论，对于认为绝对不能和经济分隔的“必要”的观念提出了根本的疑义。

如前所述，徂徠认为人伦的全体性的“道”是礼乐这个物的人际关系的体系。礼不是抽象的理或观念，而是看得到的具体物的关系。（“礼必备物”^①）并且，徂徠用“文”的概念说明礼乐的体系性，换句话说是人际关系的全体性构造。

古昔道谓之文，礼乐之谓也。物相杂曰文，岂一言所能尽哉？古谓儒者之道博而要寡，道之本体为然。后世贵简贵要。夫直情径行者，戎狄之道

① 《弁名·节俭》。

也，先王之道不然。^①

例如，吃喝（饮食）行为。在礼乐不存在的世界即人伦以外的世界中，吃喝和为生存所必要的行为、动物的行动一样是单纯而直接的行为。然而如果吃喝是人类活动的话，它是规定在被形容为与直接的必要性无关的、无法用一句话表达的复杂的动机即“文”（文、饰）的人伦全体性的行为。总而言之，人作为人所做的行为，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其他，都不是为生存所直接必要的行为。

那么，在人伦的内部，人作为人进行的活动是什么呢？即不是生存必要的行为，作为“文”所做的行为是什么呢？

徂徕对“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②一文，作了如下解释。所谓“本”是礼以前的行为其本身。例如，是指作为吃喝的行为其本身，作为射的行为其本身。“文”是将其行为装饰成礼。射弓矢的行为，“本”是射倒敌人获取猎物的有用且必要的行为。圣人根据礼乐修饰这个行为。只是作为礼乐的“行射”之中，忘掉了“本”的有用性、必要性。但是其本来的有用性已经不必再提了。

有时又这样说。燕飨之礼的始原“只在于吃喝”。后来当圣人根据礼乐修饰它的时候，口渴时即使有美酒也未必喝，空腹时即使眼前有好肉也未必吃。因为作为礼，即作为人伦行为的吃喝，不是为了吃喝而吃喝的。^③

如前所见，徂徕认为在自然和人类活动（人伦、道）之间存在巨大的飞跃、断绝。直接性、必要性、有用性是自然的领域，与间接性、生存必要无关的装饰性属于道的领域。

主要由经济活动形成的利用厚生之道，乍看起来像似必要性、有用性的领域。但是必要性、有用性不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它们不过是随着礼乐的制定被忘却、丧失的非本来的东西，即自然的残滓。利用厚生之道也不属于自然的欲望或

① 《弁道》。

② 《礼记·礼器》。

③ 以上，《弁名·文质体用本末》。

本能的世界，而属于礼乐的世界。

总而言之，“文”是相对于必要的事物，形容不必要的事物总体的概念。它是作为自然的生的剩余的文化的生，是相对于实利、实用的无用的装饰。

徂徕认为，人类活动的全体性是具体的、物的关系体系的礼乐。“文”是指作为礼乐的现实的人类活动的所谓本质的概念。包括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类活动的本质是“文”，即与有用性、必要性无关的“装饰”。人作为人所做的行为中不包含必要这个概念。即经济不是“下层建筑”。人类的活动都是与生存必要无关的作为“文化”来进行的。他所理解的经济和现代人的常识正相反，是“上层建筑”之一。

五、经济—“剩余”

深入到徂徕礼乐论的论理中，或许会发现这种完全舍弃“必要”概念的奇特的经济理解。

如果说生产、消费、交换凡是经济活动都与生存的必要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大多数人会嘲笑不止。但是这种想法果然有那么奇特的吗？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所阐明的错误性常识之一，就是认为自然食料丰富的未开化人懈怠。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未开化人不仅不懈怠而且极其勤勉，不管需要与否不厌倦努力生产。和辻哲郎也根据这一点论述了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只在生存的必要。

“然而更进一步是否可以这样想：即所谓生存的必要性并不是生成复杂间接的经济活动的理由。”

凡是生物都以某种方式填充生存的必要性，并在这种状态中得到满足。人既然是动物的一种，就和动物一样，每当缺乏时，必然要通过采集、捕食来填充生

存的必要而活下去。但是，作为人的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生产、采集不管规模多小，或多或少已经超越了直接的必要性。人进行的经济活动是经常超出必要之外的动作（使用工具、不饿也劳动等等），又经常生产出必要以外的东西。如果是这种想法，不妨可以说，人的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必要性无关的对自然的剩余。

如果从为了生存的必要性的观点出发，徂徕所说的礼乐都是无用的装饰（文）。但是徂徕认为，使人成为人的本质（道）的确就在于与这个有用性及为生存的价值距离远的文化性。还认为，自觉这个文化性并完成人伦的和谐的全体性正是为政者的职责。换句话说，包括衣食住的安定的狭义经济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都不得以道的本质即“文”为基准进行控制。

对于这种观点所包含的重大意义，徂徕本人未必是自觉的。作为其证据，徂徕自己提出的具体的经济政策依然没有摆脱以自给自足经济为模式的统制经济政策的反复。然而徂徕在礼乐论中所显示的对经济的洞察，对于摸索克服现代经济观的模式的我这个时代来说，包含着极其重大的启示。当然其有效性的程度还有待于今后的验证。但是至少可以指出的一点是，认为经济活动的本质完全在于“文化”性而与必要这一概念无关的想法不光是一个礼乐，能够在亚洲的整个仪礼世界中发现。日本的神道就是一个例子。

神道也是一个仪礼世界。在那里，外观上和人的日常行为（例如农耕）相同的行为由神来进行。按照现代人的常识，日常进行的农耕是本体，仪礼中的农耕是模仿本体的装饰。

但是，本来神道的农耕仪礼中进行的动作或供奉在那里的大米、酒等生产物是超出日常生产活动的剩余。假设如徂徕的洞察所示，始于农耕的经济活动其自身的本质在于剩余性，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作为纯粹的剩余、装饰而进行的农耕仪礼反而才是农耕生活的本体。

折口信夫这样说道：

神道的信仰中，人的所有行为是把神的世界中神们的行为当作模范反复去做。神将稻种授与天皇委任其农耕，天皇再把它委任给百姓。百姓按照命令进行农耕，将收获还给天皇，天皇再把它还给神。^①

诸民族的神话同样告诉我们，经济活动起源于神的世界。神的世界是按照与人或动物生存的自然界不同的逻辑运行的世界。神的世界是基本上富饶没有不足的世界，即从生存的必要解放出来的世界。仪礼世界的共同观念是经济活动起源于与生存的必要无关的世界。这种观念对于思考经济的本质来说是极其有趣的。

总之，毫无疑问，亚洲传统思想中隐藏着动摇我们的常识——经济与生存的必要无关——的观点。

确实想一想，即便废弃存在于今天的一切经济活动，人的动物类也不会灭亡。在那里发生的不过是人重新回到只根据生存的必要而活着的“动物”。如果是那样，重新把握今天支配世界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剩余、装饰，未必能说是愚蠢的企图。然而即便如此，再次成为问题的是，结合今日的经济该如何规定与生存的必要无关且构成经济的本质的“文化性”。经济人类学中所说的“呪术性”或者作为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而言及的“情报”“流行”等，也许和徂徠所说的“文”在某一个点上交叉的概念。不管怎样可以指出的一点是，称之为入伦或礼乐的亚洲的传统思想概念，在讨论“脱现代”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失去其有效性。

（作者系日本 东京大学 大学院 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伦理学)教授 / 权锋女 译）

投稿日：2010.6.21

刊载决定日：2010.7.20

参考文献

荻生徂徠，《论语徵》，载《荻生徂徠全集》第2卷、河出书房新社，1978。

———，《弁名》，载《荻生徂徠》日本思想体系36，岩波书店，1973。

① 《大尝祭本义》。

———，《弁道》，同上。

———，《政谈》，同上。

———，《问答书》，载《近世文学論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4，岩波書店，1966。

石田梅岩，《都鄙问答》，载《近世思想家文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7，1966。

山鹿素行，《山鹿语类》，载《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4 卷、岩波書店，1941。

福沢谕吉，《学问のすゝめ》，岩波文庫，1942。

和辻哲郎，《伦理学》，载《和辻哲郎全集》第 10 卷，岩波書店，1962。

折口信夫，《大尝祭の本义》，载《中公文庫折口信夫全集》第 3 卷，1975。

Thoughts of Rite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Kakumyo Kanno

Defining economy is a quite significant issue in discourses of post-modernism. Current methodologies to discuss the notion of economy have been monopolized by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sciences while eastern counterpart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have been excluded.

The economic activity is one of the parts of whole human activities, therefore ethics exploring the entire matrix of human activities, regardless eastern or western, has examined the substance of economy. For instance, Watsuji Tetsur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Japanese ethics scholars tried to find the substance of human being from the ambition to achieve ethical humanity. In this regard, economic activity is not mere an action to fulfill material ambitions but an attempt to achieve common goals of entire human beings by using human instinct pursuing materials as a medium.

Watsuji's ethics are based on western ethics, Buddhism, and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 element to examine modern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Japanese Confucianism. Ogyu Sorai's notion of rite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of "economy" came from the Confucian notion of "Ruling the World and Governing the People", and Sorai who had criticized Zhu Xi's focusing on self-cultivation actively adopted this notion into his ideas. Economy is the entire relationship among materials and rite is the ethical subject of them. From this perspective, rite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creeds to understand economy.

To Sorai, human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rite were not from natural instinct but

from cultural action separated from natural instinct, and this was oppositional to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modern economy respecting natural instinct as the basi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 believe that we can learn several lessons to properly understand modern economy from Sorai's ideas.

Key Words: Economy(经济), Watsuji Tetsuro(和辻哲郎), Ethical Life(人伦), Ogyu Sorai(荻生徂徠), Rite(礼), Culture(文)

